



2011年5月26日,参观者在广州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参观。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原为番禺学宫(孔庙),始建于1370年。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举办,周恩来、肖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94年前,一位34岁青年用脚丈量,考察湖南农村大地,擘画了革命最关键的路径

毛泽东的32天700公里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一条老街、一座古殿,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迹。这座富有特色的庭院式建筑,红墙碧瓦,青砖地面,时光的痕迹从这里走过,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

94年前,寒风逼人的一月,株洲醴陵先农坛,即神农殿,这个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神庙里,闯进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蓝布长衫的90后青年。

醴陵市博物馆90后解说员刘晓讲述,史载,从湖南湘潭市一路赶来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顾不得一路辛劳,急着招呼当年湖南一师的同学、时任中共醴陵地委书记罗学瓚与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筱山,提着装有笔记本的袋子,几位90后青年开启了一场关系到解决中国革命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考察。



》 寒冬腊月的 三下乡

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从历史的演进来看,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国运兴衰。近代以来,农民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力量,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关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1926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敏告诉记者,1927年1月4日,刚过了34岁生日的毛泽东之所以急着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是革命背景使然。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党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工人运动,如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水口山工人罢工等,为后来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示范。在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之后,当时的农民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是一些军阀和农村的一些地主劣绅产生了恐慌,将此称之为“痞子运动”。李敏说,因此毛泽东决心到田间地头、农户乡舍去看个究竟。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信念之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湖南一党史研究者向记者讲述,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1926年6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忧虑。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同年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说得更加直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3个月后的1927年1月,毛泽东在29岁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湖南省)第一书记戴述人陪同下,徒步700公里,足迹遍及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而在株洲醴陵的8天,在毛泽东的调研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

醴陵市博物馆的肖邦祥介绍,虽然深冬时节寒风凛冽,毛泽东仍在醴陵的先农坛、文庙、东富寺等地走访,并多次主持召开了农运干部的调查会议,了解农运情况。

》 红色真理从实践中来

进入先农坛大门右侧,这里保存着毛泽东所住房间的原貌,老式木床,长方形的黑色书桌,整个房间显得简单、朴素。刘晓说,1926年前后,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醴陵是湖南农运发展较快的县之一。北伐军取得醴陵泗汾战役的全胜后,醴陵农运迅速发展起来,会员增至20万人。但当时的农民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劣绅污蔑为“痞子运动”,党内外倾向投降主义者迁就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加以责难。

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肖邦祥说,毛泽东带着这些疑问,到醴陵农村去寻找答案。

1927年1月28日晚上,毛泽东在先农坛正殿二楼召开全县农运干部调查会。留存至今的木质楼房里,复原了毛泽东当年开会时的摆设,房间摆着长条凳子,柱子上挂着马灯。因年代久远,墙上的红漆有一些脱落。

在先农坛居住的5天里,毛泽东深入县城,详细了解当地情况。2月1日,农历除夕,他顶着鹅毛大雪,步行15公里,到醴陵南乡的东富寺继续考察。

90后博物馆讲解员刘晓对目光敏锐

的毛泽东满怀敬仰。总能从变化和矛盾中看到更高远的地方。她说,当毛泽东听闻有农民因除夕欠谷物而被地主逼死的事例后,指出:要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情况,特别发掘这样苦大仇深的人加入农会,这样的群众积极性最高,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他还进而指出,除了政治上的打击,还采取其他办法,不准谷米出境,不准抬高物价,不准囤积居奇等。在经济上予以限制。

在县学李祠、县总工会办公处,毛泽东得知当地工农武装一举攻破了县团防局后,非常高兴,指明要发展农民自己的武装,组建农民自卫军。他在东富寺的戏台上发表了一次演讲,以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告诉农民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一个比方:东富寺的围墙是用三合土筑成的。其中的沙子本来是散的,加上黄泥、石灰,用水和拢,干了以后,用羊角耙都挖不进。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刘晓说,在醴陵考察期间,毛泽东还提出了革命最关键之处——解决土地问题,重新丈量后,把地主土地收集再均分。

通过在醴陵的实地考察,毛泽东获得了在省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第

》 国运兴衰的百年警示

一手资料。同年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毛泽东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湖南农村:农会势力地方,牌赌禁绝,匪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他阐明,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多方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所谓“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里,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下称《报告》),用大量确凿的事实,力证农民运动“好得很”。报告中提到和引用醴陵的事例有14处之多。经过这次考察,毛泽东更加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和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1927年3月5日起,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时年28岁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对此著赞叹不已。他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在国内,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刘晓介绍,史料载明,此后整个湖南农运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仅毛泽东考察过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几个县,农会会员骤增至46万余人。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醴陵当地,大批青年志士踊跃加入红军,截至新中国成立,牺牲的醴陵籍烈士有5万多人。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金龙撰文称,《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办农民学校,建立

这里开创了党的廉政建设先河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在旧社会,安源煤矿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活最重、钱最少、生活最坏,苦得不得了。一家几代都是煤矿工人的熊立纯谈及当年安源路矿工运时,忍不住叹息。当年,他的爷爷因瓦斯爆炸事故,死在了煤矿上。

到了熊立纯女儿一代,回顾那段历史时说,相比过去,更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更多的安源青年是从历史书和纪念馆的文物中建立起有关这段历史的记忆和思考的。

萍乡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里不乏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青少年,他们有的背着相机一个人来的,有的是父母领着来的。在这段历史的开篇,馆内的讲解员会告诉他们,安源是我党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实践地,被誉为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从1921年到1930年,安源路矿工人革命斗争历时近10年,毛泽东同志更是10次来萍乡、8次来安源,亲手点燃了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火种。

小石子凝结在一块就不容易搬动了

安源路矿是株萍铁路和萍乡煤矿(现为安源煤矿)的合称,安源工人大多数是来自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的破产农民,路矿两局工人最多时有1.3万多人。

萍乡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陈列大楼里有一处萍乡煤矿总井口总平巷的复原陈列,参观者可以通过走进巷道,体验当年工人下矿井的感觉。据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长黄洋洋介绍,巷道内循环播放的10余个声音片段均在矿井中实地录制,井下的水滴水声、挖煤声、拖煤车运转声,甚至连矿工的粗重喘息都十分清晰。

工人们每天早上5点多顶着星星月亮下矿井,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动12个小时以上,晚上看着月亮出矿井。萍乡市红色文化和党性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黄仍一直在研究安源革命斗争史。他说,作业时工人没有衣服穿,身上只围一块三尺大的布,这块布有包头、围身、洗澡等几种用途,渴了没有水喝,饿了只能吃发霉的食物,身体遭到严重摧残。

据1918年统计,工人中患肺病、肠胃等病的有90%以上。有的巷道非常矮小,工人只能侧身挖煤,挖出来的煤全靠人工拖运。工人嘴里衔着一盏小油

灯,爬在地上将两三百斤重的煤拖运出来。且井下安全设备极差,经常发生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工人生命毫无保障。

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斗争。从1901年到1919年,安源工人先后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自发斗争,但是,由于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

90后讲解员杨凤说,毛泽东第一次来安源考察就下到矿井与工人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的疾苦,用浅显易懂的比方,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启发工人受苦不是什么命中注定,而是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结果,工人团结就好比把许多小石子凝结在一块,就不容易搬动了。

1922年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召开支部会议,作出了立即组织路矿两局工人大罢工的决定。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发出罢工命令,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工人经济组织

罢工持续了几天,安源路矿当局仍拒不接受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并想尽种种诡计破坏罢工,但均遭失败,无奈之下路矿当局决定与工人俱乐部谈判。9月16日上午,俱乐部委派刘少奇作为全权代表来到萍乡煤矿总公事房进行谈判。

历史上,刘少奇和路矿当局的这次谈判,为大罢工的胜利和《十三条协议》的签订奠定了基础。

在黄仍看来,《十三条协议》的签订一定程度上为安源工人在政治、经济方面争取了利益。不过罢工成功后工人的经济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大的提升。

薪水不高是因为兑换难,工人每兑换一次就受一次剥削。黄仍提及之处,在《李立三回忆安源工人学校、消费合作社和大罢工》一文中也有相关印证。

李立三指出,当时工人受商人的剥削最重要的是银元换铜元,1块银元应当换280枚铜元,但在每次发工资时,1块银元只能换到260枚铜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老后街的门市开张营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工人经济组织。

合作社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为了弥补资金不足,消费合作社发行了股票、铜元票、纸币,进行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和对股份制的最初的有益尝试。消费合作社还成立了兑换股,可兑换银元、铜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储蓄金融机构。

(下转4版)

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身穿一袭长衫,左手握拳,右手挟伞,步伐稳健。这是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中描绘的毛泽东1921年秋第一次来安源时的情景。

刘春华在1967年创作了这幅油画,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9亿多张,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幅油画。在该油画的基础上,1969年2月刘春华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进行了再次创作。

安源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毛泽东于1921年秋第一次来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师附小主事(即校长)。1921年秋,毛泽东来安源考察,在八方井四十四号住了一个星期。

在安源考察期间,毛泽东深入洗煤台、锅炉房、餐宿处等工作处,下到矿井最艰苦的工作面和工人促膝谈心,与工人同吸竹筒烟,广泛地接触工人,进行调查研究。从谈家常入手,了解工人的疾苦和安源的阶级状况。

萍乡市红色文化和党性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黄仍介绍说,这次考察,毛泽东亲身体会到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对工人的思想状况有了真切的了



图为刘春华1969年2月再次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供图

解。更加确定安源工人阶级是我们党完全可以依靠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基础。

这是建党后,毛泽东最早开展群众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实践地,从现实层面推进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深度融合,从而为党组织在安源和安源工人中的扎根与发展,作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黄仍说。

